

為人知、乏人問津，直至作者以人類學角度，將重慶大廈及各個在當中活動的人和他們的故事，向世界各地的讀者展現出來。本書出版後，獲得一致好評，媒體訪問、名人推介、榮登書店暢銷排行榜、得獎好書殊榮……這是作者研究所得的成果，亦揭示了讀者對香港的人文研究是有需求的：香港還有多少如重慶大廈般的滄海遺珠？如果讀者問「為什麼是重慶大廈」，相同的問題也可以放在其他地方、社區、族群。人類學角度寫成的民族志，對普羅大眾及不同領域的學者而言，都是了解某地區某群體的上乘之選，而且它逐漸成為學術研究和普及知識的潮流。重慶大廈的研究，正好提示人類學學者及歷史學者需加把勁，發掘更多具啟發性的研究題目。

鄧秀貞
香港科技大學語文中心

葉崗、陳民鎮、王海雷合著，《越文化發展論》，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362頁。

葉崗、陳民鎮、王海雷的《越文化發展論》（以下簡稱《發展論》）一書是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結項成果，無論是材料的使用還是理論的提升，都是近年來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突破。該書試圖勾勒出越文化發展的軌跡，並提煉出越文化「點狀突進」的發展規律，其着力點不限於「史」，還在於「論」。在「史」的方面，作者充分借鑒了分子人類學、考古學、新出土文獻等方面的新材料。尤其是對分子人類學相關成果的借鑒，是近年來史學研究與分子人類學研究相結合的嘗試。「史學與基因的交融雖然艱難，但互動已經開始」（徐傑舜、李輝，《嶺南民族源流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513）。這方面的嘗試，該書在論述越文化的「先越文化」、「越國文化」兩個階段時有所體現，本文的評述便集中於此。

在論述于越的族源、吳等周邊民族的源流、百越的源流、越地的民族變遷、秦帝國統一背景下的民族融合、越文化的海洋性諸問題時，《發展論》均對分子人類學的研究成果有所關注。徐傑舜、李輝合著的《嶺南民族源流史》（以下簡稱《源流史》）也是充分借鑒分子人類學研究成果的新著，《源流史》與《發展論》兩書的重要交集是關於百越源流及遷徙的研究。前者的研究主要以李輝有關澳泰族群遺傳結構的系列研究為基礎，該書勾勒出

以北部灣為中心的澳泰族群擴散歷程。百越及其後裔是嶺南民族的重要構成，而《發展論》重點涉及的，則是百越的重要一支——于越。早在〈論于越的族源〉（《浙江社會科學》，2008年，第10期）一文中，「越文化發展論」的課題組負責人葉崗對於越的族源作了初步的討論。在該文中，作者已經注意到分子人類學的研究成果，也作了一些辨析與反思：「在現代生物學技術發明之前，科學界也曾經存在過這樣或那樣的辨析人類種族問題的科學依據，這些依據因限於當時科學技術發展的水準和層次而為新的發現所代替。當前的分子生物學技術將辨析人類種族問題的科學手段提升到基因層次，這固然是科學發展的一個進步，但我們還不能說它就是最終的手段。」這一提醒從現在看來是值得注意的。由於族群源流史所關涉問題的複雜性，分子人類學的出現雖然為學者提供了進一步探究的利器，卻並不意味着能夠最終解決問題。

在後來的〈于越族源問題考論〉（陳民鎮、葉崗撰，載《民族史研究》，第12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5，頁282-304）一文中，「越文化發展論」課題組作了進一步討論。值得重視的是，在該文中，課題組結合分子人類學的新進展對於越族源問題作了深入的分析，該文也構成了《發展論》第一章第一節的基礎。作者將于越的族源分為三個層次：「一是百越集團的血緣特徵，可以追溯到距今二萬年前的北部灣地區，是為百越的祖源；二是東南越人的血緣特徵，形成於距今8,000年左右，稍遲於本區域出現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時間，因此，若單從血緣看，于越是距今8,000年左右本土起源的；三是從代表歷史時期越國文化的民族共同體看，于越在馬橋文化階段以後在越地逐漸形成」（頁60）。

相較於《源流史》探討族群源流時過於依賴基因的線索，《發展論》則對於越的族源作了具體的分析。一方面，于越的族源或者說百越集團的血緣特徵，以及東南越人的血緣特徵，作者都是依靠分子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同時參考考古發現得出的——史前時期正是文獻材料的盲區；另一方面，作者也充分考慮到民族形成過程的複雜性，結合文獻記載和考古學材料，指出于越作為一個具體的民族，實際上應該是在馬橋文化階段以後在越地逐漸形成的。如此一來，又擺脫了血緣的束縛，對於越的形成過程進行了更全面的分析。

此前李輝等對良渚文化、馬橋文化的先民遺骸作過檢測，證明均屬於越人血統，從而為分歧很大的良渚文化族屬爭議，以及良渚文化、馬橋文化之間的斷層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但《發展論》並不滿足於簡單認定創造「先

越文化」的人群看作一個連續的、靜態的整體，而是根據考古學所觀察到的嬗替演變，尤其是廣富林文化、馬橋文化的大量外來特徵，指出越地人群的變動。《發展論》對考古學研究成果的重視，又是《源流史》所欠缺的。嶺南地區同樣有豐富的考古遺存，是文獻和基因之外的另一重要線索來源。

關於于越的來源，有「越為夏裔」之說，《源流史》根據其他學者的意見，指出「歷史文獻說百越源於夏民族不可信」（頁99）。但《發展論》通過梳理文獻指出，古人只是說越王是夏人後裔，並不是說于越源自夏民族，更沒有說百越源自夏民族。對於「越為夏裔」這一古人深信不疑但今人嗤之以鼻的論調，《發展論》卻在討論其成立的「可能性」：「王油坊類型文化遺存是中原龍山文化體系的一員，廣富林文化受到其強烈的影響。在夏代的時間範圍之內，一支來自北方的考古學文化來到越地『另立門戶』，顯然是值得玩味的」，「錢山漾文化與廣富林文化的發現，至少讓我們知道這麼一個事實，那便是良渚文化之後，東南地區的文化與北方的文化有着明顯的交流，少康封無余於越地並不受地域阻隔的影響」，「限於材料，我們尙難將『越為夏裔』的說法坐實，但在眾口一詞的傳說以及考古學提供的線索面前，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這一說法的可能性」（頁34）。作者並沒有落實「越為夏裔」說，而是通過梳理相關文獻記述和考古發現，呈現了「越為夏裔」的可能性，提醒我們簡單否定該說並不足取。

《發展論》還進一步提出「二分論」的族源觀，指出過去「一刀切」的做法並不足取，強調區分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的族屬的必要。通過梳理古今王室與子民族屬不同的現象，為我們審視族群源流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二分論」的族源觀實際上作為看待問題的新視角，有助於我們反思過去機械化的族源研究，《發展論》這一觀念性的啟發值得我們進一步總結。

我們不難看出，《發展論》有意調和文獻記載、考古發現以及分子人類學的材料，這種調和不一定是最終的結論，而是在分析矛盾背後的可能性。或許這種調和有其缺陷，但作者在材料運用上的綜合性以及看待問題的全面性，堪稱族群源流史研究的典範。

分子人類學的研究起步不久，雖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突破，但考慮到取樣的代表性、解讀的客觀性等問題，其結論遠非最終的答案。《發展論》對分子人類學研究成果進行了合理的利用，但又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同時，在閱讀大量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在用於佐證自身論點的同時，還提出了一些新的構想。由於典型的百越遺傳特徵 Y-SNP 單倍型 O1-M119(H9) 在史前的東北地區也有發現，作者強調雖然古代「夷」、「越」的區分還是比較嚴格

的，兩者的分佈地域和文化特徵均有不同，但兩者可並稱「夷越」，泛指東方及南方的民族，「夷越」有可能存在遺傳結構的交叉，在語言以及文化特徵上也有一定交集（頁60）。作者注意到溢出百越族群而共見於澳泰族群與東夷族群的文化特徵，跳出「夷越同源」與「夷越無關」的簡單論斷，在更廣的視域內對東夷和百越兩者間的關係進行思考。面對現代漢族中的O1-M119，作者指出「其來源還需要審慎探討，單純將其視作漢族的同化作用所致似乎並不恰當。良渚文化曾對全國有過較大規模的文化擴張，這一文化擴張是否伴隨人口擴張有待研究。從現代漢族O1-M119的分佈情況看，以江浙為中心（即良渚文化的主要分佈地帶），層層遞減。O1-M119廣泛滲透進漢族群體，是在良渚文化之前，是在良渚文化時代，是越國極盛之時，還是在越國滅亡之後，都是值得研究的」（頁27，註腳2）。《發展論》一書對「良渚時代」進行了討論，強調了良渚文化對三代文明的強烈影響，梳理出良渚文化的文化因素向北方地區滲透的線索。無獨有偶，在《源流史》一書中，作者也提出這樣的猜想：「良渚文化消亡以後，有觀點認為其中一部份人到了北方，在中原建立了夏朝。如果是這樣，北方的O1的分佈倒是可以解釋的。但是這還需要更多材料的支持。」（頁276）這些探討實際上可以為分子人類學的進一步研究提供思路。

《發展論》和《源流史》不約而同對分子人類學的研究成果給予關注並非偶然，分子人類學的介入為研究族群源流史提供了新鎖鑰。在解碼人類基因的同時，分子人類學也在不斷解碼歷史上不同族群的源流變遷。這一工作方興未艾，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廣泛的合作，尚有非常廣闊的探究空間。《發展論》在使用相關材料時存在工具化的傾向，這一傾向有可能導致對相關材料的誤讀，需要引起我們的警覺。同時，《發展論》也提醒我們，分子人類學的研究成果並非最終的結論，族群源流史本身是非常複雜的研究課題，需要我們更加綜合、辯證地進行研究。

康瀚予
西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